

普鲁士王家图书馆所编《御书房满汉书广录》

何文波

柏林国立图书馆始建于1661年,它的前身是普鲁士国立图书馆及王家图书馆,现在则是德国的国家级图书馆,由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进行管理。

由于该馆始建时,正好是耶稣会士来华,东学西渐,欧洲皇室产生“中国热”的年代,加上柏林本身就是东方学研究重镇,因此该图书馆从一开始就与东方学图书尤其是中国图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该馆网站上列出了十种特藏,第二项是42170种东方手稿,第八项是20余万种罕见刻本(如明早期刻本),东方学图书在该馆的地位可见一斑^①。

1665年开始,勃兰登堡选帝侯威廉大帝委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私人朋友搜求中国图书,并邀请汉学家为其编纂书目。先后为这些汉学馆藏编目的有柏林神父、著名东方学家米勒(Andereas Müller, 1630-1694.)和著名学者柯恒儒(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1783-1835,亦即下文音译之“克拉普若特”)等。第三位为将图书编目的是柏林大学教授硕特(Wilhelm Schott, 1807-1889.),他将书目定名为《御书房满汉书广录》,于1840年出版^②。硕特本人所作的序言落款日期为1840年6月1日。

威廉·硕特1802年9月3日出生于缅因茨,1889年1月21日卒于柏林,是德国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他首先在柏林大学学习东亚语言,1833年开始教授中国语言与哲学,1838年获得缅因茨大学副教授职位,并教授土耳其语、波斯语、汉语、满语、蒙古语、藏语、芬兰语、匈牙利语、察合台语以及日语。硕特是柏林考古学、人类学与史前史学协会荣誉会员,被称为最谦逊、最勤奋的德国汉学家之一^③。

①<http://staatsbibliothek-berlin.de/ueber-uns.html>.

②张国刚:《中国人编写的葡汉词典——柏林国立图书馆“汉学书库”访记》,《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3日。

③译自维基百科“Wilhelm Schott”词条,http://de.wikipedia.org/wiki/Wilhelm_Schott.

一、《御书房满汉书广录》的结构

硕特所编纂的目录德语原文为: *Verzeichniss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schu - Tungusischen Bücher und Handschriften der Königlichen Bibliothek zu Berlin, eine Fortsetzung des im Jahre 1822 erschienenen Klaproth'schen Verzeichnisses*, 可以直译为《普鲁士王家图书馆汉语、满族通古斯语图书目录, 1822年柯恒儒出版目录之续编》, 硕特自己取名为《御书房满汉书广录》。该目录收入了普鲁士王家图书馆1822年至1840年间入藏的中国书籍。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①与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先后于1998年和1999年访问柏林国立图书馆, 并看到了汉学书库的部分善本。张国刚对硕特这本目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硕特把克拉普若特以后新增图书分为‘历史与传记’、‘民族学与地理学’、‘统计与法律’、‘宗教与道德’^②(其下又分儒学、道教、佛教、近代哲学、大众道德哲学5个子目)、‘语言文字与古礼’^③、‘文选’、‘类书与杂纂’、‘文学’(包括诗歌、小说与剧本、文集)、‘医书’、‘术数’^④、功夫、经济、技术与占星术’、‘传教士著译书’和‘地图’等12个门类。收入了1831年东方学家诺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 1793-1870)从广州等地求购的满汉文书籍。诺曼是著名德国传教士郭士腊(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的挚友, 他购买这批书得到郭士腊的帮助, 其中有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等鸦片战争前在广州、马六甲等地编辑出版的一些中文作品”^⑤。

硕特的目录对于汉学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不仅因为这些图书部分已经散佚, 而且从目录本身来看, 体例严谨, 考据丰富, 尤其是对图书内容的理解, 也基本与原书吻合, 可见硕特本人的汉学功底相当扎实。

硕特目录格式为: 中文题名、拼音题名、形态说明、在汉学书库中的编号以及内容简介。

比如:

第一行, “御书房满汉书广录”为目录总题名。

第二行, “Geschichte und Biographie”(历史与传记)为十二个门类中的第一大类。

①周振鹤:《柏林读书小记》,《中华读书报》1998年11月11日。

②原文为“Philosophie, Religion und Moral”,应译为“哲学、宗教与道德”。

③原文为“Sprach-, Schrift- und Alterthums-Kunde”,应译为“语言学、文字学与考古学”。

④张氏所称“术数”,原文为“Strategie”,即“战略”。按,硕特目录中该类图书仅一种,即北宋许洞所撰之《虎铃经》卷二十,为兵法书,所以这里的“Strategie”似应译为“兵法”,归入“术数”类的原因,大约与此书中包括“风角占候”等术数的内容有关。

⑤据前引张国刚文。

御書房滿漢書廣錄

Geschichte und Biographie.

I.

通鑑綱目

T'ung-kiän-käng-mü

[20 Bände. L. S. 343-362.]

Eine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s von *Tschu-ki*, dem Philosophen und Erklärer der kanonischen Bücher, welcher um die Mitte des 13^{ten} Jahrhunderts unserer Zeitrechnung lebte.

第三行,“I.”为每个大类中的图书编号。

第四行,“通鑑綱目”为图书题名。

第五行,“T'ung-kiän-käng-mü”为注音。

第六行,“20 Bände. L.S. 343-362”表示该书共20卷,依次编入汉学书库343至362号^①。

在简介中,硕特主要介绍了图书的主题、作者、篇章结构,还对部分作品的学术价值、历史源流作了考证。硕特主要依据书籍的序言,从中抽取初版时间、再版时间、最后修订时间等版本信息,注明作者或编者的姓名拼音。对于印本的质量,硕特也进行了说明,比如嘉庆八年刻印的六卷本《太平寰宇记》,硕特特别指出该书“纸张美白,印本洁净”。硕特对内容的分析绝非浮光掠影,而是深入探求,并且依据自己对中国的了解加以说明。比如对《通鑑纪事》的介绍中,硕特指出该书为纪事体史书,同时介绍了司马光与朱熹等人的编年体方法,并总结认为,纪事体更接近于欧洲人叙述历史的习惯。

二、《御書房滿漢書廣錄》所收录的图书范围

除目录本身之外,其中所包含的书籍当然更值得重视。通览整部目录可以发现,在1822到1840年这十馀年间,普鲁士王家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图书内容十分丰富,涵盖面非常之广。如果从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来看,涉及了经、史、子、集各个方面;从思想流派来看,包括了儒、释、道乃至民间信仰;从时间空间跨度来看,既有古代刻本,也有阐述近代思想的书籍,乃至学习外文的手册,都兼收并蓄。

^①硕特目录中汉学书库编号部分,对数字进行了略写,比如《通鑑纪事》标注L.S.445-59,表示445至459号而非59号。

在整个目录中,说明文字最为详尽的有四种:《通鉴纲目》、《大清会典》、《韵府拾遗》及《册府元龟》。后两种为类书,《大清会典》也有一定的工具书性质。对于任何图书馆而言,具有知识检索功能的工具书都是收藏的重点。而上述四部典籍卷帙浩繁,内容广博,印本精美,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因此硕特对它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读和介绍。

本目录中大多数典籍为常见古籍,有一些自宋朝以降多次再版,但也有一些体现了独特的时代特点和区域特点。比如张国刚和周振鹤同时提到了《御书房满汉书广录》中的一本书,名为《红毛话》。张国刚翻译了硕特对该书的介绍:“这是一本交际用的英文词汇表。其英文单词不是用字母拼写,而是汉字注音,使用的是粤语方言。如英文 come,注音‘金’,因为‘金’在粤语里读 kom,而不是像官话那样读 kim。这恐怕是中国人编写的最早的英汉词典,时间在鸦片战争前(1831年以前)”。^①

能够搜集到这些书,也跟采访者的活动范围有关。如前所述,采访者多为欧洲在华传教士,他们在华南的广州等地搜罗图书,甚至远到马六甲的华语出版物也在搜集之列,因此类似英汉词汇表的图书出现在目录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硕特对一些历史书籍的介绍,也暗含了独特的兴趣取向。比如《南唐书》附录中关于朝鲜与契丹的内容,《太平寰宇记》中关于四夷的内容,包括匈奴、突厥、金发乌孙,乃至《西域闻见录》等书,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可见了解中国历来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至少是硕特及当时西方汉学家的兴趣点之一。

三、《御书房满汉书广录》收录图书现状

本目录所含图书的一部分现藏于柏林国立图书馆的手稿善本部,即“汉学书库”,其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故散落在俄罗斯、波兰等地,也有部分已经无可稽考。这些书籍绝大多数为汉语,有少量为满语。目前仍保存在柏林国立图书馆的图书,可以使用该馆的在线目录进行检索,除了题名、著者检索之外,还可以用“[SGB] Signatur”直接输入“Libri. Sin.+数字”检索,比如输入“Libri. Sin. 735”就可以检出《列仙传》。不过上述方法并非完全适用,比如在硕特目录中著录的《明朝纪事》,柏林国立图书馆在线目录著录为《明鉴纪事本末》(又名明朝纪事本末),在汉学书库中的编号为“Libri. Sin. 460/464”,而直接输入“Libri. Sin. 460”却无法检出。此外,维基百科批评柏林国立图书馆在线目录中对于二战散佚文献没有进行完全回溯,很多文献的返回结果都是“可能因战争散佚”^②。

^①据前引张国刚文。

^②译自维基百科“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词条,http://de.wikipedia.org/wiki/Staatsbibliothek_zu_Berlin。

四、《御书房满汉书广录》指瑕

硕特为每部书的题名加注了字母注音,可见他的著录并非依葫芦画瓢,而是逐字考据的。但作为外国人,书写中国汉字难免有疏漏的地方,以下为笔者校对后发现的部分讹误:

第14页,《太清会典》,应为《大清会典》。按古代“大”、“太”两字常可通假,但此处“太清”之“大”有“广大”、“盛大”之意;本目录中,不仅汉字写作“太”,注音亦作“Tai”,可能为抄录之误。

第18页,《太清律例》,应为《大清律例》,同上。

第22页,《季条例》,应为《四季条例》。

第42页,《清土文》,应为《龙舒净土文》,柏林国立图书馆目录作“龙舒净土集”。

第43页,《慈悲道场悔法》,应为《慈悲道场忏法》。

第48页,《玉历传》,应为《玉历钞传警世》,此处可能是硕特的省写。

第77页,《野获编》,硕特著录年份为“道光七年(1828)”。按道光七年实际应该是1827年。

第94页,《六十重曲》,应为《六十种(種)曲》。

第103页,《本草必要》,应为《本草备要》。硕特著录为《本草必要:Pèn-ts'òo-pí-yáo》,作者为“Wang-jin-ngan”,1694年时为80岁。按《本草备要》作者汪昂(1615-1695),字切庵,与之相合。

上述讹误占全目录的比例很低。从总体来看,硕特的这一部目录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和实用价值。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